

教育经济学资料

(内部参考)

一九八五年第四辑

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经济学研究会
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

中心资料室编印

目 录

·教育经济思想史资料·

1. 古典 教育经济言论摘编.....王丽..... 1

·国外教育经济学文献选载·

2.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

〔英〕理查德·S·埃卡斯..... 29

·教育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参考资料·

3. 教育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第二章 教育经济学的过去——思想评介..... 61

古木教育经济言论摘编

山东师范大学 王丽

古木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育经济学”概念的教育家。本世纪三十年代他曾写过一系列教育论著，最主要的有《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教育经济思想。兹摘编部分资料作一介绍。

（文中小标题系摘编者所加）

一、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然则教育背景如何？简言之，即整个的社会皆为教育背景，凡与教育发生关系者均属之，固无大小之分焉。详言之，则有经济的背景，社会的背景，政治的背景与学术思想的背景等。盖经济为民众生活之基础，优劣良窳系焉。若教育之进行舍经济的背景而不顾，则教育必为优越阶级之占有物，一般民众只有坐观其成而已，及其极也，或将成为而推倒之。如此，不但无益于民众，而教育且遂成为罪恶之阶梯。”

《现代中国及其教育》第1页

“若就其间关系言，则经济也，社会也，政治也，学术思想也，皆可为改进教育之动力，使之日益进展。而在他方面观之，则教育又可为改良经济，改进社会，改革政治，改造学术思想之工具，使其更适合于现代民众生活之需要。反言之，经济，社会，政治，学术思想等亦可以阻碍教育之进行，使其不易发生积极的功效，甚至教育之发展足以造成特殊的经济，特殊的社会，特殊的政治，特殊的学术思想。故谓教育与背景之关系，含有不可分离性，实无不可也。……”

“……‘经济观’之意，即谓今后中国教育之设施，无论其为制度或方法，皆当以经济的标准为衡，切不可再蹈复辙，一以模仿为能事也。盖中国国民经济能力之薄弱（详后），欲‘迎头赶上去’，追蹤先进诸国，则一切教育上之设施，皆当力求其历程之经济，不宜稍有浪费。分析言之，则有四端，即力求：（一）金钱，（二）时间，（三）精力，（四）机会之经济也。过去中国国家之贫乏，有限金钱之浪费，各种事业

之后，国民精力之衰败，大好机会之放纵，皆一一表示。不经济之意；今后欲改弦易辙，则教育上之一切设施，不可不注意经济的标准，以期培养经济的能力。”

《现代中国及其教育》第2页

“但无论如何，总是站在经济的立场上来观察中国的教育，推论中国的教育，……倘使我个人不遭意外的变故，能有长时期的机会来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如学制，课程，方法，行政等，他日如有所得，或可再作一本较有系统，较为严密，较具积极计划的《中国教育之经济学的研究》。”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弁言第4页

“要想希望这种教育能够救国，不但是做梦，简直是‘误尽天下苍生’！教育者如果想改造这种教育，决不是模仿日美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所能奏效，必须要明了‘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然后根据这种教育的立足点，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教育，这样才是‘新教育’，也是中国教育者今后应当努力的地方。”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6页

“……目前中国的教育，应以‘经济’为出发点。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宜依据国民经济的状况，一方面须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而最后更要注意培养经济的能力。”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2页

二、教育与生产的关系

“我以为教育家第一不要希望‘贪天之功’，把教育看作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工具；至多只可认到教育是一种‘助力’或‘阻力’，协同其他的‘力’，可以帮助人民解决‘生’的问题。第二在自己的园地里努力从事下列各种的耕耘：

一、在消极方面谋最小的浪费

1. 经费方面；
2. 劳力方面；
3. 时间方面；
4. 机会方面；

二、在积极方面谋最大限度的效果

1. 生产的效能；
2. 事物的利用。”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16页

“中国农业因为耕地面积狭小，使用过渡，肥沃减损，而农具又多不良，畜工又极缺乏，因此劳力的效能非常的小，兼之资本短少，借贷不易，购买新式有效的农具和牲畜肥料等均感困难；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靠着过去的经验去从事小规模的生产。无如天不助人，人更相害、常常发生水灾、旱灾，而病虫害时而不绝，防除这种灾害的技术又极幼稚；加以田赋地租的苛征重剥，有加无减；生产所得，往往不及损失支付之大。所以经营农业的结果，不免‘年丰而儿嫂啼，春暖而妻号寒’！这是中国农业的特征，也就是中国农业的病征”。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226—227页

“中国的工业受了内外的种种桎梏。原料方面，有的本国不能出产，有的本国产而不合用，有的本国产价高于舶来品，有的本国前产来源现绝，结果，非仰给予外国，即不能供工业上的生产。而资本方面又多障碍，在乎自己感不发展，一旦遇着紧急，更无法周转，结果，常不免停业倒闭。至于工人方面，因缺乏良好的训练，且极少机械的帮助，所以工作效能很低，加以近年来工潮时起，动辄罢工停业，结果，匪特不能增进生产，甚至损失甚大。再加以组织管理不得当，不能充分运用人力和物力，本来很想增进生产的，结果，反而牺牲，反而损失。而捐税方面，在外国都可以借关税的力量来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但中国的关税则适得其反，摧残的力量有余，保护的力量不足，结果有许多工业都受捐税的影响而衰落，而破产了！即以小规模的工业来说，因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已经深入内地农村，关税壁垒不能保护此等小规模的工业，就是在华的设厂制造权也无法限制，更无法取消，结果，小规模的工业也不免被帝国主义者的势力压倒，发展更是不可能。简单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工业受了内外的种种桎梏，匪特不能生产，甚至有时且不免停业，倒闭、破产！”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306—307页

“在这种严重的情形之下，中国教育界的有心人（？）便很勇敢的肩着大任，想到利用教育的力量来促进生产，大有常燕生君说的，‘……中国今后至少五十年内须打倒‘文雅的教育’，而专力提倡物质的教育，‘生产的教育’，才能有民族复兴的希望。……’（注一四六）提倡‘生产的教育’，能有这么大的力量，使民族复兴，我们决不反对，甚至极端赞成，十分希望。不过赞成和希望均属主观的，而教育能否

发生这么大的力量，乃是由客观的条件决定的。所以我们虽不必绝望，却也不必奢望，只要细心地去检讨这种客观的条件，便不难得到最后的结论。我们首先要考查的是过去的事实，因此我们问：过去中国的“教育”和“生产”，有因缘吗？依我个人的浅见，可以回答说：

(一)“教育”与“生产”，由来是绝缘！

“中国向来的教育都是以养成‘治术人材’为目的，而不在造就‘技术人材’，以耽用的；换句话说，就是养成统治阶级的预备军——士大夫，而不在造就从事生产的专门知识分子（注一、百七）。最明显的例，便是孔子的教育。孔子教人，虽然注意个性的差异，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各因其材而施教，但对于农业一科却很不注意，甚至完全鄙视。

“孔子的教育影响相沿至今不绝，所以中国的农业也是一天衰败似一天！纵说现已不少农科大学，但是毕业生的目的仍在‘参加县长考试’（前年广东县长考试曾发生过这个争执），仍在‘从政’，研究农业不过‘门面话’而已！试问教育与生产的因缘在哪里？”

“一脉相传的教育如此，外来的教育又何如？当中国最初采行西洋资本主义的教育时候”（一八六二），固不曾想到教育和生产有何关系，只因为帝国主义者的轮船枪炮十分厉害，把中国的门户打得洞开，甚至把中国的文化践踏了。中国一般士大夫看不过去，要想防御，要想反攻，不得不效法他们制枪炮，造轮船，筑铁路，……等等的技术，同时又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和他们直接交涉，用中国的文化来感化他们，因此种种关系，便想到“办学堂”这回事。但是学堂办了三十余年，仍然没有想到教育和生产有什么关系。直到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学部奏请示教育宗旨，才略为提到这一点。该《奏折》中说：

‘……方今环顾寰球，实利竞尚，尤以求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益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注一百八）

“而《上谕》也是这样的说。

‘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物无弃材，地无遗利，期有益于国计民生。’（注一百九）

“但是实际上教育的设施如何？果真能超出‘治术教育’的范围，而注重培养‘技术人材’吗？我们遍检载籍，都不见这回事；只有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所定《学堂选举章程》载着：‘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和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奏定《考验游学生工商科进士办法》，规定：‘习文科者则称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其政法科，商科、工科，格致科，农科，医科，仿此。’环球各国原是利用教育培养‘技术人材’，‘以求实业为要政，使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唯中国采行新教育后，仍蹈复辙，以教育为造就贡生，举人，进士的工具，使学堂出身的人都去‘从政’，尽成压榨劳动民众的分子，试问‘技术人材’将何由而成？既无‘技术人材’，难道可以空言国计民生吗？毋怪乎兴办教育数十年，富强不可得，而贫弱且不免随学校的增加而益甚哩！试问教育与生产的因缘在哪里？

“满清腐败，教育的设施如此；民国更新，教育的设施又何如？自自然改革学制（一九二二）所定的标准，如‘（四）注意国民经济力’，和‘（五）注意生活教育’，等，未尝不比满清时代为进步，而最近通令中小学教科书（自然，地理）加入国货生产事业（一九三〇）和提倡劳动生产教育（一九三一），更足表明教育与生产的因缘。

“劳动生产教育，的确要多方面宣传提倡。不过宣传提倡以后，大

家仍就不劳动，不生产又奈何？我们试一考察劳动生产的‘先锋队’，便可知道。据教育部的统计报告，十七年度（一九二八年，编者注）的大学学生，除预科不计外，共有一一，八三九名，其中以法科学生为最多，计二，五六六名，占百分之二十一。而同年度的毕业生也是以法科为最多，计四八六名，占百分之二十六·五。此等学生，都是从政的‘治术人材’，而非劳动生产的‘技术人材’。真正准备劳动的‘技术人材’，如农，如工……实在是寥寥无几。

“研究政治的学生如此之多，固然表示中国人注重‘管理众人之事’；但同时也足以表示中国人到如今还不能跳出‘治术教育’的范围——圈套——典型。而准备劳动生产的‘技术人材’既如此之少，提倡生产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括一句话，提倡‘生产教育’是一件事，而大学生，留学生对于‘治术教育’——政法科——发生浓厚的兴趣又是另外一件事。而且在中国人看来，这两件事是‘分道扬镳’，各不相谋的。毋怪乎教育部‘三令五申’，而结果还是如仰尧君说的话一样：

‘有具之才，倒还可设治；可是无具之才，却不易物色。这次各工厂因为原料缺乏，有的要造三酸，漂粉、烧碱，有的要造炭酸钙，有的要造炭酸镁，有的要造硫酸亚铅，有的要造铅笔，有的要造衣针，有的要制麻，有的要造纸，可是最难求的是人才，是真人才，是学识经验兼富的人才，是以事业为前途肯奋斗肯耐劳的人才。托人没得，托职业介绍所没得，于是不得不借材异地，聘用客卿。因为托人谋事的，向职业介绍所登的，是普通人才，是法学文哲学人才，是社会学人才，而目下工商界所急急需要的是专门人才，是工业人才。供求不相应，谁任其咎？我也要怪起教育界的人了。因为教育是教人求生的，是教人有出路的。为什么办学数十年，教出

来的人，都是想做大官，做名士，做诗人，做无用的学者？」（注一百十六）

“其实这种现象并没有什么奇怪，正是因为教育与生产无缘，所以教出来的人，只想做大官，做名士，做诗人，……而不肯做工商界，工厂中的生产者。他们进学校，出洋留学的时候已经立定志愿，所以要入法学院，文学院。只可惜教育部要提倡劳动生产教育，只能叫中小学校的學生去参加校內的劳动工作，注重教科书中的生产事业；却无法限制法学院，文学院的大学生不做官，不做名士，不做诗人，而象欧美各国的大学生一样，去做工厂中的生产者！工厂中或农场里既没有‘技术人才’，做‘先锋队’，领导中小学生从事于生产，而徒凭一纸命令叫中小学生参加校內的劳动工作，注重教科书中的生产事业，难道中小学生真有天大的本领，就可以生产吗？大学生要进法科，文科，要做大官，要做名士，要做诗人，显然是‘治术教育’占优势，工厂中或农场里缺乏‘学识经验兼富的人才’，缺乏‘以事业为前途，肯奋斗肯耐劳的人才’，分明是‘技术人才’不足道，谁说民国时代较胜于满清？

“再从别方面观察，教育与生产不特无缘，并且是绝缘，正如‘越人之视秦人的肥瘠，风马牛不相及也。’，我们且不说教育是‘万能’，也不说教育是‘无能’，只说教育是一种‘力的作用’，在积极方面可以协助其他生产的要素，促进生产，在消极方面也可以协同其他反生产的要素，促成破产。中国教育的力量是哪一种？是促进生产呢，还是促成破产呢？照我个人的浅见看来，后者的成份较多，甚至完全属于后者的力量。

“举个例，先就农业的生产来说，各种生产的要素，如土地，如劳力，如资本，如技术，如租税等，上面已经详细说过，大都不容易

使农业生产，甚至有的反使农业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教育已难乎其为协助的力量了，何况更有不协助生产的教育呢？

“中国的教育与生产，不但是绝缘，甚至教育实行摧残生产！最显明的事例便是抽收田赋亩捐充教育费的江苏各县。据报章所载：‘江苏各县教育经费，向由地方筹措，情形不同，多寡亦异。全年经费，多者三四十万，少者仅万元。其种类除行政收入外，……系就田赋忙漕项下，分别带征。此项收入，占各县教育经费收入之大宗。带征项目，分下列数种：（一）忙漕附税，（二）屯芦场灶渣课税，（三）冬漕加征，（四）忙漕带征，（五）滞纳罚金，（六）教育亩捐，（七）普教亩捐，（八）其他。……各县教育经费来源，以田赋为收入大宗，其次为亩捐。以百分之七十为义务教育经费，百分之三十为民众教育经费。据最近统计，全省各县教育经费总数，已近一千万元！（注一百十八）千万元’的数目拿去办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自然不算多，而且是为农民谋福利的，更不能说不应当，但是六十县受教育的儿童有多少？据报章所载：‘……六十县失学儿童共三百九十九万五千二百九十六人，已入学的儿童共五十万零八百二十五人。’（注一百十九）可见农民所得的利益（？）实在无几，却是田赋亩捐已经抽收到农民不能负担了。若再长此以往，也只好‘鬻田园以输纳了’。横竖都是为农民谋利益（？），田园卖完了，教育家更省得谈农业生产的问题。不过从农民方面来看，这样的情形，实无异摧残生产！江苏的情形如此，难道其他各省就没有同样的情形吗？

“再就工业的生产来说，中国教育也是一样的和生产绝缘。教育家要想这样幼稚的工业生产，且不能创造原料，多筹资本，亲作劳工，自己管理自己，……但至少对于保护幼稚工业生产的关税和各种税厘，都应当切实研究，使它协助工业的生产。但是实际上如何？匪特不加

研究，甚至不加赞助！

“‘我们给了钱给外国人，以取得笔，墨，纸张，书籍，来用；而我们不能运用这些以钱换来的东西去向外国还（狭义的）本钱，利息更是没有。那吗，我们花给外国的钱和进贡有何区别？’留雨若这些话已经把奇怪的理由说明白了。

“中国教育愈发达，读书人愈多，读书人愈多，向外国进贡愈厚，尤其是对我们的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贡尤多。

“综上所述，简单说来，中国到如今还是‘治术教育，占优势，技术人材，没有出头的机会。因此，教育与生产不但无缘，并且分家，甚至有时教育还要侵夺生产的家财。结果，生产变为破产。而农业衰败，工业不振，便是这个表征。教育家不看清事实，只是无事时高谈生产，一旦临阵，即作‘壁上观’。有时还要‘落井下石’。象这样的情形，试问从哪里去生产呢？”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311—328页

“中国的农工实业自身既因种种要素或条件不完备，不容易生产，而教育又与生产无缘，甚至绝缘，更不容易谈到促进生产。这么来，产业衰落，民生凋敝，‘穷’与‘乱’，成了循环式的复演，真使中国的有心人（？）焦急得很！因此，‘妙想天开’，想到要解决‘穷’与‘乱’的问题，首宜发达生产，而要想发达生产，尤当先叫‘教育与实业结婚’。

“求职业者以国内大学毕业生为最多，其次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又其次为专门专科学校毕业生……。以大学毕业生，专科学校毕业生，留学生的资格，尚不能和实业发生‘恋爱’，而结婚，终不免成为‘旷夫’，其他可想而知。

“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不能与实业结婚？这个原因是很容易明白的，试看下列一段责难的话便可知道。

‘中国目前之教育，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足以适应国家之需要。而弊害之最显著者，尤莫如教育设施与国民实际生活不相适应。以致未受教育者，尚能秉其家庭社会之相传习之知能道德，各自安于艰苦之生活；而已受教育者，则知识技能之修养，既不能熟，性行气质又往往涉于浮夸与矫情。驯至学校多一毕业生，社会即增加一失业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子弟。话消灾起，弊害丛生。及此不为适当之矫正，将见教育愈普及，而公私生活所受之祸害愈广。’（注一百二十五）

“中国的‘实业’，……遭受的天灾，受的人祸，受的虫害，受的统治阶级的摧残，受的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以及种种不可名状的痛苦，不特弄到‘头破血流’，简直把生产要素都完全弄到不可救药了！”

“中国实业的病也是一样。所以疗治这种病的方法，不外对外反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对内铲除贪污失职的官僚。……中国实业不排除上面两种障碍，也是不能恢复他的原气，更谈不到建设与发展。

“梁先生（指梁漱溟，编者注）最近主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论，真不少创见。照他所说，乡村建设，真足以‘……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注一百三十六）里，果真象这样光明（？）的路，谁不愿走呢？不过照梁先生所列举的经济，政治，教育或文化三方面的建设事业看来，前途也不少荆棘，恐非研究院的学生所能胜任吧？……‘最当先解决之绝大问题，尚无法解决，试问研究院‘二年结业’，‘一年结业’（结业较毕业新鲜）的学生就能推动‘数千年经济文化停滞不进之中国社会’，吗？就能抵抗‘七八十年外人经济侵略’，吗？就能安定‘二十年国内’

秩序紊乱，吗？就能使产业不‘洞残’，吗？就能使地方不‘疲敝’，吗？就能促兴‘基本之农业’，吗？就能建设‘下层之乡村’，吗？我提出这些疑问，并非有意鄙薄研究院的学生，不过觉得这些问题都有‘最当先解决之绝大问题，在。

“若再问中国教育为什么不能促进生产？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回答道：

- (1)因为中国的农工实业自身缺乏健全的生产要素；
- (2)而教育与生产又由来是绝缘，且在当今时代，‘治术教育’仍占优势，‘技术人材’始终没有抬头；
- (3)所以当农工实业发生危急存亡问题的时候，办教育者只作‘坐上观’，从不跑上前线援助农工实业界的作战，甚至有时还要‘落井下石’；或简直就是‘助桀为虐’；
- (4)结果，希望生产不可得，而破产即在目前了！

“此时大大小小的教育家（？）才起来高谈生产的教育和教育的生产，试问生产在哪里？到哪里去生产？”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328—359页

三、教育成本

“学生用费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无疑的，中国目前的教育已经带着‘资本’色彩了！但是这种色彩的程度，或浓或淡，非经实地的测量，不能知道。我为着想明了这点便设法调查各校学生的用费，分析的说，计有下列几种目的：

- (一)使家庭父兄知道培养一个子弟要准备多少钱；
- (二)使办教育者知道现在的学生家庭要负担多少重；

- (三)使学生自己也可和他人比较，知道自己用钱是多还是少；
(四)使研究教育者更可借此以推论国民的经济能力和今后教育发展的关系。

“现在的教育，或者是一天发展似一天，但考察其内容，大都是‘有名无实’的。追询原因，众口一词的说‘经费不充足’。于是聪明的办学人员，或‘素负盛名’的学校，想着扩充经费，便不顾学生家庭的负担，任意增加学费，图书馆费，体育费，杂费，……了。果真学生的父兄有能力负担，横竖都是为子女谋幸福(?)，自然无妨。但实际上是否有此种能力？我又有点怀疑。

“发展教育，大抵是没有人反对的(?)，不过到了国民的经济能力不能负担教育经费的时候，或者要停顿也未可知，甚或有人作猛烈的反抗也很难说。办教育不能把所有的青年儿童都赶出社会人群，尤当把青年儿童送回社会人群。社会人群是求现实的生活，学校教育所造就的青年儿童决不可成为超脱的生活。然而我们试一考察目前的现状，办教育者是日夜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而国民的经济能力是日渐衰败，学校教育所造就的青年儿童更是日离社会人群而走入‘游民之国’，我真不知道教育从何而发展？又不知道发展教育有何用处？

“以上几点怀疑和感触，便是我调查学生用费的目的。”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65—67页

“上表所列的用费，是包括缴交学校的各费，膳费，宿费，服装费，书籍费，杂费，和其他临时费等。统计起来，照各级实在用费的中数计算，换一个‘小资格’，便需要毫银五〇八·五二元；换一个不完全的‘中资格’，便需要毫银一，一二〇元；换一个‘预备资格’，便需要毫银八〇三·二〇元；换一个‘大资格’，便需要毫银一，八九一·六

〇元，合计换一个‘完全资格’，便需要毫銀四，三二三·三二元，平均數更多，需要四，四四六·二六元。即以全体的中数来说，要换一个‘完全资格’，至少也需要毫銀四，〇九二·二〇元，平均數更多，需要四，三八六·四〇元。但这还是指各費不全有的而言；如果学、膳、費，……各費全有的，需要更多，合计换一个‘完全资格’，便需要五，四三二·四〇元（中数），多至六，〇七七·二〇元（平均數）。换一个‘资格’，需要这样多的費，试问那些毫无‘资产’的农工民众子女从何处去换取‘资格’呢？纵会有时为着要想换取‘资格’，可以向人借贷；但是借贷而无‘资产’作抵押，又有谁相信呢？……纵令能够借贷，也不知要費多少力量！”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67—48页

“分别观察表三，除第一年级学生外，大抵用費都是隨年级而递增。以中数(Median)说，第一年级为二一八·三元，第二年级为一九五元，第三年级为二二五元，第四年级为三〇七·五元，各级合计为二二一·八元。以平均数(Mean)说，第一年级为二二六·二元，第二年级为一九五·八元，第三年级为二三一·七元，第四年级为二九五元，各级合计为二二八·五元。”

《中国教育之经济观》第78页

“再就用費的来源说，也很值得研究。譬如有一个学生，每学期总计用費二五〇元，如果他自己能够获得二〇〇元，那么他的家庭仅负担五〇元。另有一个学生，每学期总计用費二〇〇元，他自己毫无